

柳立言先生的师友杂忆

——港中文、普林斯顿、史语所往事

赵晶

在普林斯顿大学,柳立言先生的授业恩师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刘子健先生。如果说柳先生与刘先生在治学思路有所不同,据我观察,至少可以举出以下一点:刘先生认为,“既然牵涉到大问题,就直接去研究这大问题,不要拐弯抹角”;而柳先生则倾向于将问题分解为大、中、小层次,“一个大问题是由多个中型问题所构成,一个中型问题是由多个小型问题所构成,三者是层层堆叠。要回答一个大问题,必先回答多个中、小问题,很难一步登天”。

与柳立言先生的通信,始于2009年11月18日,目的是为《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邀稿。柳先生于当月23日回信,承诺将于2011年投稿一文《〈名公书判清明集〉里的无名案件》,此诺已践(文见《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5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2018年11月7日,柳先生在来信中言道:“[明年]二月一日退休后,不学不术,从此不涉足学界……亦很难再跟您对话了,现在就多谈一些吧。”读罢悲怆之感油然而生,于是着手逐渐翻检迄今为止收到的千余封来自他的邮件,内容广涉生活琐事、学界掌故、行政纠葛、人物臧否等等,其中自然有一些不足对外人言的事情,但也不乏足可启迪后学的方法论(对此,我将另撰一文《花落一梦三十年——柳立言先生谈学术评论》)。

就我个人而言,这些年但有一些想法,就会马上写信向他汇报,柳先生每次都会不厌其烦地示下条分缕析的意见,甚至将他已加思考但尚未完成的一些篇什掷下,希望由此引导我转换研究方向。他一直强调“法律不能不吃人间烟火,而烟火最盛之处,应是大多数的平民……这方向决定了笔者不会研究政治案件,不会研究官当八议,不会研究法典的编纂,也不会研究中日法律之关系”(《宋代法律史研究之史料结构与问题分析》,《法制史研究》第27期,2015年,第277页)。四个“不会”之中,我占其二,所以他曾口头指出,我是“在用手术刀认真地解剖尸体,毫无烟火气”。

每个人的研究路径与主题当然有各自的生成之道,柳先生的上述立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撰写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李鸿章的外交,在普林斯顿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以宋孝宗为研究对象,显然与他后来进行的法律史研究有所不同。如果说

他是我尝试改变自己重要推手,那么哪些师友曾在其型塑自己研究特色的过程中发挥过作用呢?以下摘检出一些他的师友杂忆,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部分答案。

需要说明的是,以下凡是没有在行文中直接交代通信时间的方式予以说明;部分因省略上下文语境而难明具体所指之处,皆在其后加“笔者注”;此外,通信闲聊的文字未必严格讲求文法,有时也有一些文字的省略,故必要时用〔〕对内容加以补缀。

香港中文大学时期 (1975—1981)

“无论如何,从法律的角度研究《宋史·刑法志》,重点不在撰者是谁,而在《刑法志》本身写得好不好。有如双匿名审查,不必管作者是谁,只管内容好不好。”

从网上所见香港培正中学同学会和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校友会所发布的信息来看,柳先生名列培正1975年级听社、崇基1979年历史系,由此可以推知他于1975年入读中文大学崇基学院,1979年本科毕业,转入中文大学研究院攻读哲学硕士学位。

关于1949年之后香港学术界的状况,已有诸多“新亚”学人的回忆录可供参考。柳先生也曾谈道:“香港素被讥为文化沙漠,但我求学之时,大学里精英云集,既有从大陆南下的‘大师’,也有从台湾北上的‘中师’,如未成大名之前的余光中和王尔敏等,又有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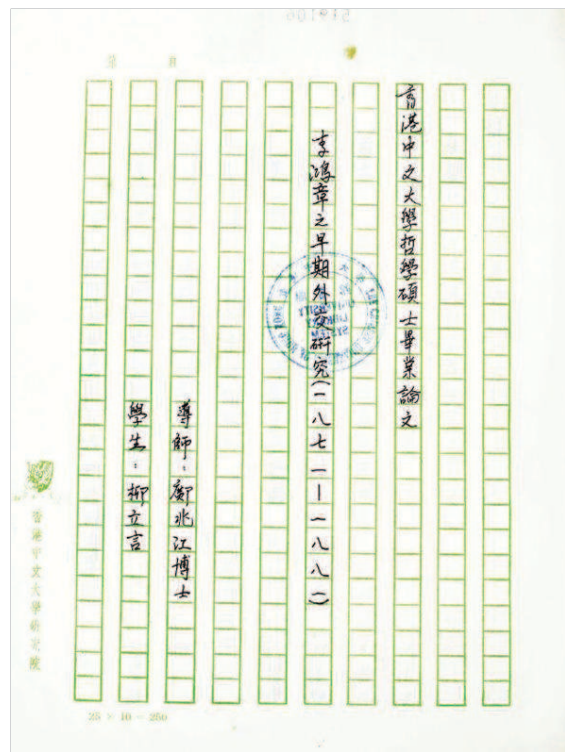
本地从东西两洋归来的、难以尽数的‘小师’,故学子稍能一窥学术之堂奥”(2018.1.31)。

从2018年5月21日的邮件(见后)以及从香港中文大学网站上下载的硕士论文电子版可知,柳先生的硕导是邝兆江先生。只是我孤陋寡闻,对邝先生的道德文章所知不多。征诸网络,邝先生的著作中有一篇《近代口述历史的发展》(《明报月刊》1981年9月号)。柳先生曾回忆自己的访谈经验:“我在香港时也跟老师做过口述历史,访问一些老人,想了解日治时期的香港,一般问题还可以不着痕迹,但一旦深入,例如想知道对方对日治的真正感受,和这感受是否偏颇,就不能不针对他的感受进行测验,做测验就不得不设计问题,那就很容易陷入引导,得出可疑的答案,隔几天再去访问,但问不一样的问题,结果答案跟日前相反”(2016.1.5)。这里的老师应该就是邝先生。

2016年6月27日,我去台师大参加李国祁先生的追思会,听张朋园、张玉法、陈三井等先生的发言,重温了“中研院”近史所早年的内斗往事。之所以是“重温”,是因为许多情节已见于《南港学风: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九州出版社2013年)。王尔敏先生没有出席,但寄来悼念文章,由别人代读,内中所涉李先生因何落选“中研院”院士、自己因何受刘广京与费正清先生的推荐于1977年赴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等情节(此文以《悼念史学名家李国祁先生》为名,发表于《国史研究通讯》第12期,2017年6月)。会后,我给柳先生写了一封邮件,发表了一些感慨。柳先生在回函中忆及:“王〔尔敏〕老师跟我的硕论导师不大合,对我却很好,一生难忘。他三十多年前教我时,眼疾已很严重,看东西成曲线状,我当时难以领会其苦,今日则身受



柳立言作学术报告时的留影



柳立言硕士论文, 下载自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网站“硕博学位论文库”

矣。最后一次见他是荣退会上,尚能视物,真是大幸。……您把王先生的《准军志》跟他其他著作比较,便知郭廷以先生花了多少功夫指导近史所的诸公了”(2016.7.8);此后我们又谈及王先生所撰《史学方法》与杜维运先生的《史学方法论》,柳先生的评论是“‘简明扼要’不是王老师的风格”(2016.7.19)。

柳先生以李鸿章作为硕论对象,自然与王尔敏先生过从甚密,不过此后以宋史为业,尤其是以唐宋变革为思考的出发点,应该也受到了唐宋史学者孙国栋和罗球庆先生的影响。如我们讨论如何阅读《资治通鉴》以及目前对于《通鉴》的导读作品时,他曾经提